

一二九運動史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
《一二九运动史》编写组 编

北京出版社

一九八〇·十一

《一二九运动史》内容提要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它的历史经验永远值得后辈青年学习。《一二九运动史》是一本系统记述这一伟大运动全过程的历史专著，曾在一九六一年初版。这次修改再版，增添了丰富的史实，具体生动地写了“一二九”时代爱国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和培育下，为拯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英勇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并走上与工农群众和革命武装斗争相结合的道路，献身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斗历程。

一二九运动史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
《一二九运动史》编写组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375印张 143,000字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1

书号：11071·140 定价：0.78元

编写者说明

为了纪念伟大的“一二·九”运动四十五周年，继承和发扬在我党领导下的学生革命运动的优良传统，我们特将《一二九运动史》一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史》编写组编写，北京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改写出版。

这次的改写，着重在党对“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一二·九”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反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诞生和发展壮大等方面进行了充实。其他方面也有所补充和订正。本书由原来的七章扩展为十章。

在改写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当年“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姚依林、蒋南翔、郭明秋、陈翰伯、孙敬文、宋黎、刘杰、牛荫冠、段君毅、李昌、杨述、史立德、高文华、刘导生、丁秀、张震寰、刘尊棋、朱丹、王翰、雷洁琼、陈明、谷锦生等同志的热情指导和帮助。他们在百忙中，或抽出时间接待我们的访问，或应邀和我们一起座谈，亲切地向我们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党的领导作用，回忆斗争的情景和经历。同时，我们还研究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回忆录。这些对于我们理解和掌握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历史，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彭真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我们还得到许多单位的大力协助：中央档案馆、共青团中央研

究室、共青团中央团校、中国革命博物馆、人民出版社第二编辑室、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中国青年报社等。他们积极地向我们提供有关档案和资料，使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当此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所有指导和帮助过我们的同志和单位，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忱。

参加本书改写的有：杨树先、唐纪明、王冬琳、许克清四位同志。由于时间仓促和改写者的水平有限，本书一定还会有些错误和遗漏。我们诚恳地期待着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

一九八〇年五月

目 录

历史召唤我们前进!

——《一二九运动史》代序……………陈翰伯(1)

- 一、祖国危急! 民族危急! ……………(6)
 -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6)
 - 华北——国防的最前线……………(10)
 - 革命运动的时机成熟了……………(14)
 - 在伟大的《八一宣言》号召下……………(20)
- 二、划时代的“一二·九”运动……………(31)
 -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31)
 - 沸腾的一周间……………(42)
 - “一二·一六”大示威……………(50)
- 三、掀起了全民抗日的大风暴……………(62)
 - 海河在怒吼……………(62)
 - 抗日风暴席卷黄浦江……………(65)
 - 钟山之麓扑不灭的抗日怒火……………(74)
 - 沃土中原撒下了抗日火种……………(78)
 - 海内外的广泛声援……………(82)
- 四、南下扩大宣传团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诞生……………(85)

“到农村去!”	(85)
深刻的阶级教育	(91)
战斗在平汉路沿线	(97)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战斗中诞生	(103)
五、英勇的反逮捕斗争和“三·三一”游行	(108)
英勇的反逮捕斗争	(108)
“三·三一”游行——一次失策的行动	(115)
六、爱国学生运动的巩固和壮大	(119)
加强领导 端正思想	(119)
团结群众 共同救亡	(123)
军事训练和夏令野营	(129)
为进一步争取爱国自由而斗争	(132)
七、“六·一三”——“一二·一二”	(135)
“六·一三”大示威	(135)
争取更多的人参加抗日的行列	(141)
在战斗中检阅我们的队伍	(148)
八、“西安事变”——“七·七”事变	(152)
国民党分裂学生运动新阴谋的破产	(152)
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斗争	(160)
时刻准备迎击敌人	(163)
在芦沟桥的炮声中	(170)
九、奔向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174)
把抗日救亡的种子撒遍全国	(174)
在抗日烽火中成长	(180)
灿烂的花，丰硕的果	(186)
十、结语	(192)

历史召唤我们前进！

——《一二九运动史》代序

陈翰伯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这天和这天以后发生在北平和全国的学生运动，历史上称为“一二·九”运动。我们这些走上北平大街，高喊口号的同学们，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天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伟大纪念日，然而历史没有忘记这个日子，更没有忘记成为抗日战争前奏的“一二·九”运动。

今年十二月九日，是这个伟大运动的四十五周年纪念日。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直到今天，我们的祖国已经成为一个光辉灿烂、欣欣向荣的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但是，我们怎么会忘记四十五年前苦难的日子呢？那时，日本侵略者已经把我们的东北三省、河北北部（热河）和东北部（冀东二十二县）的大片土地囊括而去。从北平沿铁路线，经过天津、唐山，直到山海关，已经驻扎上日本的“华北驻屯军”。他们横行无阻，耀武扬威，侵我城池，夺我土地，俨然以主人自居，置我人民于奴隶的境地。一九三五年六月，国民党政府下了个无耻透顶的《邦交敦睦令》，取缔一切抗日团体，取缔一切抗日言论，不许人

民有一丝一毫的抗日意识，最好永远忘掉自己是中国人民，不许反抗，不许挣扎，不许呻吟！

然而，热爱祖国的中国人民是绝对不会屈降的。就在这暗无天日的漫漫长夜中，北平大、中学学生为拯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走上了街头，迎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刀和水龙，喊出了响震云霄、颤抖大地的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

这些口号冲破了千万人胸中多年的积闷，发出了痛快而又愤怒的呼喊，集中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我们要抗日！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一二九运动史》是一支抗日战争的序曲，一支歌颂中国青年光荣传统的赞歌。

读者可以在连续演奏的乐章中，时而听到撕裂肝胆的呼号，时而听到无可奈何的低吟，时而听到充满愤懑的控诉，时而听到迎接胜利的欢乐。

当读者阅读（我简直愿意使用“聆听”这两个字了）这本历史专著的时候，我满怀深情地向你推荐乐曲中的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似乎是在交替出现，而实际上是前后连贯，一气呵成的。这两个主题是：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

抓住这两个主题，你便能够深刻掌握“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四十五年前的北平学生并不是一上来就能够正确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从不怎么认识，不太完全的认识，到比较正确的认识，再往前，一直到愿意在党的领导下，走上抗日和革命的大道，是

有一个思想激荡的过程的。

读者不会忘记，那时还是一个内战方酣的时代。在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胜利到达陕北。那时，我们的党在白区还不能以公开面目在群众中出现。我们处在地下，处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时常有同志遭到逮捕和屠杀。我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不懈地、不怕牺牲地勇敢战斗。我们完全了解群众要求抗日的情绪，充分了解群众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然而，迳直地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把我党的主张有层次地向群众进行宣传。首先我们要顺应绝大多数学生的爱国主义情绪。“我们要抗日！”——这是群众普遍能够接受的要求。其次，国民党政府能不能领导我们抗日？这就要作很多的工作。这个政府只知对日屈膝投降，卖国求荣，是有大量客观事实的。血淋淋的事实是最宝贵的教材。【我们要善于分析，善于揭露，善于引导。最后，我们要使青年学生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我们进行抗日战争。我们把青年学生们的政治觉悟提高到这样的水平，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步积累起来的。】

说是“漫长的岁月”，似乎也不太准确。从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夕，也不过是一、两年的时间。我国青年的思想政治觉悟能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完全是我党工作的巨大胜利。

“一二·九”运动不只是唤醒群众的运动，而且是为我党培养了大批抗日战争骨干的预备学校。

这批非常宝贵的骨干力量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的。当然，我不能说一上来他们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实在的，当时他们的思想是多种多样的。青年学生不能构成一个独

立的阶级。按照当时的阶级状况，他们大致上是带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是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然而他们自己还没有直接参加剥削。他们爱国，他们不满现状，他们还不会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以及改造世界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当时，人们常常说到要克服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努力改造思想，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一二·九”运动又是一次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当时的青年对形势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他们争辩，互相探讨，阅读左、中、右各派救国救民的主张、学说。他们一会儿觉得这个有理，一会儿又觉得那个有理，莫衷一是，无所适从。但是，在反复比较之后，在急剧发展的形势中，特别是在参与了革命斗争的实践以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照耀航程的探海明灯——马克思主义。只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科学的社会主义，才能救我国家于万劫不复的无边苦海。

那时，我们还看不见经典著作、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文件。只能在某些进步书刊上，或者在口头的传播中，得到一鳞半爪的革命真理。然而，只要得到了真理，我们便坚信不疑。在往后的实践中，我们更会毫不动摇，勇敢前进。

在历史的长河中，过往的事件是不会重现的。人们不会遇到同样的形势，也不会提出同样的问题。但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总会不断提出问题，并且要求我们作出正确的回答。二十世纪已经进入八十年代。现在的青年当然也会提出一串串渴望解答的问题，同样，毫无疑问，也必将作出正确的回答。

从“一二·九”运动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坚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四十五年前的艰苦岁月中，党和马克思主义是两块带有巨大吸引力的磁铁。我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很快地参加了党的行列。我们在实践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我们有了这只望远镜，就能够开阔视野。我们有了这只显微镜，就能够明察秋毫。马克思主义曾经引导四十五年前的青年走上革命的大道；马克思主义同样会引导今天的青年走上革命的大道和光辉的前程。“一二·九”时代的青年是为了保卫祖国而准备献身。今天的青年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你们早生五、六十年，你们会不会和我们的先辈有同样的理想，同样的抱负呢？你们会不会有同样的献身精神呢？我这样的提出问题，可能有点“非历史主义”的嫌疑，然而，在本书的这篇《代序》中，我很想亲切地和青年朋友们谈谈心。你们比起先辈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你们会有繁花似锦的前程，你们会有更多的献身机会。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会等待你们展翅飞翔。你们比起先辈来，会有更伟大的理想，更远大的抱负！

你们会在这本《一二九运动史》中吸取无尽的思想力量。当年的青年坚信党的领导，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在各个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四十五年前，由于革命还是民主主义的性质，暂时还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两条。今天，我们的历史已经进入新时期。我党中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要深深学习这四个“坚持”，努力掌握科学技术文化，我们一定会在未来的历史中大显身手。我们既无愧于先辈，又会为后辈树立起永葆青春的榜样。

一九八〇年五月

一、祖国危急! 民族危急!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的大举进攻。在国民党蒋介石极端反动的“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侵略者采取“绝对不抵抗”的政策下，日寇仅在两三个月内，便囊括了东北三省。祖国的两百多万平方公里的肥沃领土，三千多万人民、四千余公里铁路，丰富的资源，就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下断送了。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计划，蓄谋已久。早在一九二七年的“田中奏折”中即明目张胆地说：“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①。根据这个侵略计划，日本在占领东北以后，又向中国内地进攻，一心一意要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在日寇的步步进逼下，国民党反动政府则一再妥协退让，继续执行它的“绝对不抵抗”政策。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寇又进攻上海，侵逼南京。一月三十日，国民党反动政府仓皇迁都洛阳，蒋介石并通电全国，命令他的部队不得“轻动”。一九三三年一月，华北的战略要地“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失守。三月初，热河省省会承德又遭敌攻占，日军逼临长城各口。国民党军队中的一部分爱国将士自动请

求抗日，蒋介石却下令禁止，说“侈言抗日者杀无赦”。一年半之间，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又复门户洞开。中华民族遭受着深重的民族灾难。

在这民族垂危的时候，中国的工人、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首举抗日义旗，站在抗击日寇的最前列。“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的工人、农民组织起了数十万的义勇军，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一·二八”事变后，上海日厂十万工人发动了大罢工，坚持一个半月以上，协助十九路军作战、广大学生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示威。在日寇的野蛮侵略下，民族资本家的利益也受到损害。当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报刊，如《申报》等都撰文著论，对国民党政府的“绝对不抵抗”政策表示不满。国民党军队中的一部分爱国将领也从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分裂出来，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起而抗战。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里，代表英美帝国主义利益的走狗与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走狗之间的矛盾也日益表面化，引起了激烈的暗斗明争。总之，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的形势下，中国的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了，国内的阶级矛盾降到了次要的地位，民族危机激荡着各个阶层。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趋高涨。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说：“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②

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高擎抗日日

① 《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商务印书馆1959年11月版，第6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44页。

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旗，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并且积极领导和协助组织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号召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抗击日寇的侵略，并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援助了各种形式的抗日义勇军。“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就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中国共产党援助了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和冯玉祥、吉鸿昌的察北抗日同盟军，并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反蒋的决定。在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入华北时，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宣言，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和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等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停战议和，以便共同抗日。一九三四年五月，经中国共产党提出，由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李杜、马相伯等一七九人共同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七月，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于上海。接着，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同时派遣了抗日先遣队，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相反，国民党反动政府则坚持其卖国、内战、独裁的政策，一方面与日寇不断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一方面对共产党、红军和革命人民实行疯狂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和反革命文化“围剿”，镇压人民的抗日活动，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四年，正值国难方殷的时候，蒋介石派了重兵连续五次向中央

革命根据地和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对红色区域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在白区则颁布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施行条例”；并大发其“三天亡国”的谬论，声言“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①对一九三四年方志敏、寻淮洲同志率领红军北上抗日，蒋介石派大军堵截拦击，寻淮洲同志壮烈牺牲，方志敏同志英勇就义。对“一·二八”淞沪抗战，蒋介石非但不派兵增援蔡廷锴等率领的十九路军，而且还命令他的海军与日寇海军“维持友谊”，十九路军的英勇斗争终因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出卖而归于失败。对在长城抗战的将士，蒋介石则派兵监视。对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领导的察北抗日同盟军，蒋介石出师十万之众和日军夹击之，终陷他们于失败。在白区，蒋介石政府对人民的抗日活动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上海、天津、广州、济南、杭州、汉口等地三万爱国学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出兵抗日，蒋介石则命令军警宪兵开枪镇压。蒋介石更利用蓝衣社等法西斯组织对爱国进步人士施行法西斯恐怖手段，暗杀事件层出不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副会长杨杏佛、《申报》主持人史量才相继被蒋介石的特务暗杀。左翼作家不断遭到逮捕和杀害。宋庆龄、鲁迅也经常遭到特务的恫吓、监视，被逼得无处安身。整个白区变成了一座黑暗的牢狱，一切抗日分子的生命都朝不保夕。

日寇步步进逼，蒋介石反动政府对外不抵抗，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① 《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抗战的中国丛刊之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页。

华北——国防的最前线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二日，日寇又占领通州，侵逼平津，华北告急！

蒋介石非但不下令抵抗，反而与日寇于五月三十一日签订了由日方事先拟定的“塘沽协定”。这个开门揖盗的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有东北的合法性，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非武装区”，任凭日军自由出入。这样，偌大华北，门户洞开，日军可以随时直取平津。蒋介石反动政府愈是妥协投降，日寇就愈是得寸进尺。“塘沽协定”签订之后，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发表了一个目的在于独占中国的狂妄声明，公开叫嚣日本是东亚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中国不得与日本以外的任何国家发生关系。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而蒋介石政府却发表声明说：“中国……从无欲中伤任何他国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念”^①，表示愿意牺牲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独立，接受这种“保护”，完全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

一九三五年五月，日寇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塘沽协定”；借口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是中国政府排日，一面向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简称北平军分会）提出各种无理要求，一面调集大批军队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日本重要将领也在天津集会，扬言如不接受日本的要求，就要采取“自由行动”。结果，国民党政府又一次屈从了。六月四日，国民党政府派其驻华北的代表、亲日派头子何应钦与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举行谈判。九日，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全部答应了日寇的要求。

根据这个协定，国民党政府取消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了驻河北省的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了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撤销了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等等。从此，日寇便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实际控制了华北。接着，六月二十七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又签订了“察哈尔协定”。协定规定从所谓“满洲国”国境附近，撤走宋哲元军队和察哈尔省内的排日机关。这是“何梅协定”在察哈尔省的翻版。

从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与日本政府，进行了所谓“广田三原则”的多次谈判。“广田三原则”，是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所提出的“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活动；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日本的通讯社“日联社”、“电通社”称：十一月十八日，驻日中国代办丁绍仪到日本外务省访问重光次官，当面表示中国政府完全承认广田外相所提出的三原则^②。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日寇的屈膝卖国，更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华北局势十分险恶。除关东军向长城各口大量增兵，日寇并收买汉奸，策动了所谓“华北防共自治运动”，阴谋成立“蒙古国”、“华北国”，企图不费一枪一弹，制造一个“满洲第二”。六月二十七日晚，受日寇指挥的汉奸白坚武，自称总司令，纠合一百余人，号称“正义自治军”，占领了丰台车站，夺去一列国民党的铁甲车，开往永定门，炮轰北平市区。

由于日本侵入华北，触犯了英国和美国在华的利益，一九三五年九月，英、美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政府进行币制改革。英国

① 《外交大事记》第3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情报司1935年编印，第57页。

② 《大众生活》第1卷第8期。